镌刻在忻州大地上的精神丰碑

电影《浴血晋西北》反映了八路军浴血奋战、收复晋西北的感人故事。 宫爱文 摄

（上接第一版）

诗歌创作十分活跃。愤怒的诗人，一句诗就是一把插向敌人的尖刀。1938年10月《战地动员半月刊》上，发表诗人摇梧创作的《保卫岢岚》，这首诗采用直白短句却充满力量，如擂响了诗之“战鼓”：“你爱岢岚/我也爱岢岚/家家户户/住了几百年/要不要保卫岢岚？/——要/一个人，一支枪/你就拿定吧/从那个山头下去/向着北面/南面/东面/——到前线”。同期刊发的还有诗人王博习写于岢岚的长诗《中国人的血在远东》、诗人田野创作的街头诗《抗战军人家属》等。1938年，诗人张松如在太行山区参与抗战宣传时，听闻岢岚县三丈湾村农民娄德明把老鼠药掺入饭菜与日寇同归于尽的事迹，激发了创作灵感，遂以民歌体形式写成373行、1000余字的长篇叙事诗《岢岚谣》。也是从这首诗开始，张松如首次使用“公木”这一笔名。不久，《岢岚谣》登上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黑板报，来延安的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看到后深受触动，将全诗抄下并谱曲。2017年8月8日，郑律成之女郑小提亲赴岢岚，向岢岚县博物馆捐赠了其父谱曲的《岢岚谣》手稿，让人再次忆起那段烽火岁月。1942年，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4期发表李雷的叙事长诗《骑兵回来了：××军×旅×团骑兵连与敌人战于河曲一带的故事》，聚焦抗战时期河曲一带骑兵连队的战斗历程，将个体英雄的“死”与集体连队的“归”相交织，字里行间体现出对英雄的崇敬与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在忻州这片充满革命历史的土地，旧体诗词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且在时代的碰撞下并不缺乏现代性。如1940年11月，代县二区中共区委书记金方昌被日伪军包围抓捕，他坚贞不屈，在狱墙用血写下“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抒发了慷慨激昂的情绪，形成开阔浩大的诗境。

纪实作品不容忽视。抗战纪实作品的重要价值在于直接记录历史，无论是前线记者冒着炮火写下的战地通讯，还是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对军民抗争事迹的实录，都以具体细节与个体视角，补充了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细节。民主人士李公朴率“抗战建国教学团”考察晋察冀边区后，撰写《华北敌后——晋察冀》，其中就有关于忻州五台、繁峙、定襄的写实文字。偏关抗日县长梁雷牺牲后，其好友、著名作家姚雪垠在《抗日文艺》和武汉《大公报》发表《雁门关外的雷声》《悼烈士梁雷》两文，记述了梁雷的事迹。昭彝1938年所写的《保德锄奸记》，真实记录了“动员宣传团”奉命深入保德，与汉奸斗智斗勇、智擒要犯的全过程。“晋西事变”后，河曲县牺盟特派员、共产党人焦克显被投降势力残忍杀害，卢梦撰写《焦特派员之死》一文，发表于《晋西文艺》第1期，详细记述了这位年仅32岁的烈士“临刑前怒目睚眦，敌遂剜其双目；犹怒骂不止，又割舌，断喉；犹挺然不倒，又以棍棒猛击其头颅，血流如注而亡”的壮烈情景。文字未加修饰，却真实展现了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也揭露了卖国投敌者的丑恶行径。记者穆欣在《晋绥解放区鸟瞰》一书中创作有《围困蒲阁寨》《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东秀庄民兵中队》等篇章，晋绥军区编印有《把敌人挤出了蒲阁寨》等系列丛书，这些作品皆以纪实之笔铺展，展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在忻州抗战文学中占有很大比重。

小说创作聚焦大众。1939年春夏之交，作家碧野以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正面抗战为素材，创作了讴歌将士奋勇杀敌的长篇小说《南怀花》（南怀花，村名，指原平南怀化村，忻口战役期间侵华日军对该村进行过报复性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被楼适夷誉为“压卷之作”。可惜手稿大部遗失，但仅从《山村之夜》《回归见亲娘》《塞上》《奖章》等残章断篇中就可见其家国情怀和文学分量。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后，文艺服务人民大众成为根本方向。这年冬天，作家西戎任保德县四区抗联文化部长，以晋西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为主题，创作了短篇小说《头一次参加奋勇队》和散文《受苦的日子算完结了》，分别在《解放日报》和《抗战日报》发表。1943年，胡正分配到静乐县二区任抗联文化部长，写出了第一篇小说《碑》等作品，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由此开启文学生涯。刘白羽以保德被日寇屠城为背景创作了小说《黄河上》，将侵略者的残暴、百姓的苦难与挣扎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同年，作家束为在河曲曲峪村写出第一篇小说《租佃之间》。1944年10月，新华书店晋西北分店发行了马烽创作的通俗小说《张初元的故事》，作品以边区劳动模范、宁武人张初元劳武结合的事迹为原型，开篇写道：“劳动英雄张初元，又拿镢头又拿枪。保卫建设根据地，帮助穷人把身翻。”此后，在抗战胜利那年春天，马烽又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吕梁英雄传》也可看作是一部静乐抗战史、忻州抗战史，其主要情节、人物原型及部分地名多源自静乐，静乐人的语言特点与风格也融入了这部红色经典，同时奠定了两人“山药蛋派”作家的基础地位。1984年春，马烽来静乐采风，为创作电影《咱们的退伍兵》收集素材时，曾谈到《吕梁英雄传》的创作经过，他说：“四十年前我写了静乐的民兵，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要写静乐的退伍兵。”

必须提及的是，本土歌谣、民歌、口歌、山歌等口头文学在抗战时期得到极大繁荣，成为文化扎根民众的生动体现。五寨敌占区流传的民谣“三岔的教官命不长，五寨城的县长坐不长”，寥寥数语道尽百姓对侵略者的憎恶；另一句“打一石要五石，莜麦不够山药蛋。好人上了山，灰人当了官”，更将敌人的苛征勒索与敌占区的民心向背刻画得入木三分。抗日歌谣既能鼓舞斗志，还能瓦解伪军意志。1939年，繁峙县泽萌泉村妇救会长秦贞茹编唱了《找男人要找八路军》《警备队你早回头》等多首歌谣，组织起抗日山歌队到敌占区方圆六十多里内的村落公开教唱，甚至晚上到离县城一华里的村落去唱，使不嫁伪军汉奸、不找伪军汉奸当女婿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且《警备队你早回头》这首歌谣曾促使伪军成建制的一个班投降八路军。日军飞机轰炸河曲城后，有一首歌谣是这样控诉的：“传不死个鬼，日本鬼子真不像个人，开上他那冒烟飞机来到河曲城，先炸城关，后炸营盘；先散传单，后扔炸弹，临完捎了个簸箕弯弯。炸得老婆娃娃灰土麻沙，满身灰土，钻地道呀，哎嘿！”尽管尚不能确证这首歌谣创作时代，其歌词也有不同版本，但其还原现场能力着实令人惊叹，也成为河曲民歌传承人贾德义和他组建的田野组合演出时的保留曲目。

在根据地，口头文学呈现出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岢岚妇女儿童传唱的“劳动英雄比武哩，镢头上下打闪哩”，宁武群众口编的“合作社里买到粮，南沟山上开荒粱。今年开下五十亩，明年光景更要强”，晋西北传唱的“锄头，啦呀嘿；枪杆，咿呀嘿，咿呀呀咿呀呼嗨，劳武结合起来生产又打仗，宁武的张初元，咱们的好榜样”，再现了开荒生产与战斗的火热场景。保德秧歌《唱三巴子》中“吃水忘了掏井人，三巴子丢了心”的唱词，以通俗直白的方式劝喻三巴子加入互助变工，决心同赴花园子修水利，寓教于乐效果很好。新编的革命化歌谣也蓬勃发展起来。以民歌著称的河曲在《找了个对象是个老八路》《军民合作》《大红公鸡窗台卧》《好收成》等唱词中尽显民众对抗日军队和民主政权的敬仰喜悦之情；静乐民歌《妈妈让我当兵去》以儿子的口吻描写了母亲送儿去参军的动人场面；忻县民歌《围困歌》、代县民歌《打飞机》、定襄民歌《痛打飞鹰队》，则对敌人充满讥讽和藐视，配以群众所熟悉的曲调，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战斗的情景和胜利的喜悦。原创民歌《围困蒲阁寨》真实地再现了我军民围困日寇盘踞的蒲阁寨的情景：“十月十三那一天，命令下来打据点。前晌发下子弹来，夜晚进攻蒲阁寨。殷长久带领民兵们，抱上地雷往上冲。事务所门前埋一颗，炸死鬼子四个人。忻崞支队真英雄，一排掩护二排冲。随后跟上民兵们，要把鬼子消灭净。”听起来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被根据地军民广泛传唱。

戏剧运动 创造出空前普及和繁荣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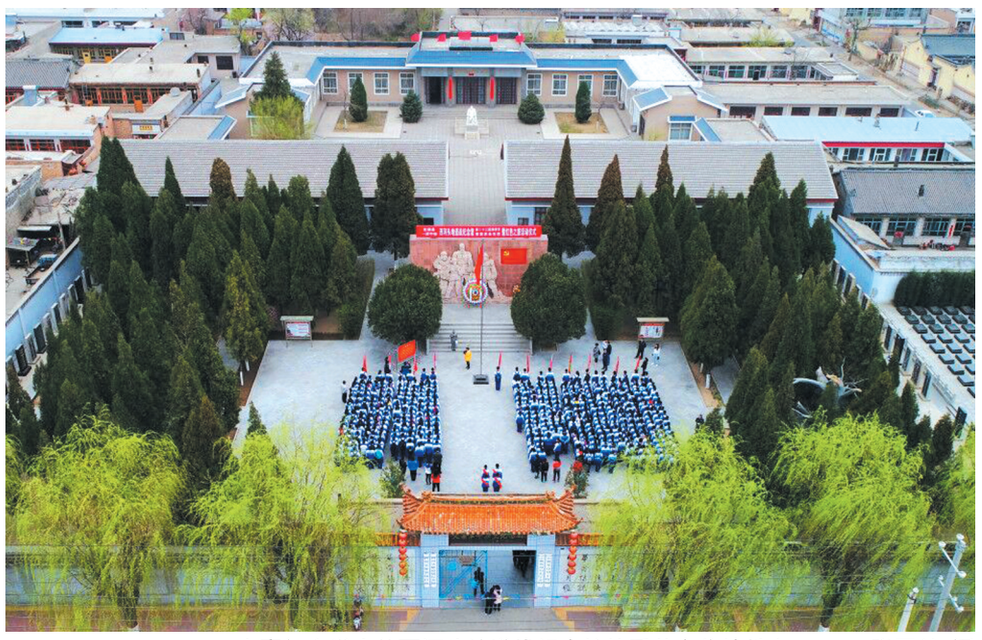
日军全面侵华后，忻州北路梆子、赛戏等传统戏曲艺术遭受重创，沦陷区职业戏班被战火冲散，北路梆子更是遭遇毁灭性打击，艺人或被杀、或逃亡、或息演，演出陷入停顿。1937年8月，日军侵入崞县，正在泥河村演出的郭占鳌戏班惨遭屠杀，著名艺人“小十三旦”郭占鳌被日军残忍刺死；“十六红”焦生玉在定襄一度被日军监禁；王玉山、董福等艺人远走内蒙搭班，“小电灯”贾桂林逃隐张家口外。然而，忻州名伶并未被日寇吓倒，反而在国难当头时奔赴光明，展现出艺人的骨气与艺术担当。“水上漂”王玉山编演《爱国女子》《火烧王靖村》等抗日小戏，奔走于五台等地宣传；定襄艺人“九岁红”高玉贵，甚至弃艺从“战”，以为抗日游击队运送物资、押送俘虏、清唱等方式投身抗战。

与沦陷区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忻州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蓬勃发展。1937年至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绥人民服务团、晋绥文联文工团、吕梁剧社、雁门剧社、晋西大众剧社、黄河剧社等一批职业剧团纷纷进驻晋西北，各县所隶属的各分区专署也均成立宣传队，演出了许多传统或新编戏曲、现代话剧和活报剧等，忻州剧院氛围一时浓厚起来。1940年成立的黄河剧社，在静乐、宁武等地演出，以话剧、歌剧形式宣传抗日。而活报剧作为一种舶来品，就是为不识字的观众提供“活的报纸”，强调应时性和时事性，可灵活在街头、广场或剧场演出，故在根据地非常流行。比如：1941年偏关县曾由青联、县政府等组织一业余剧团，于旧历正月间演出旧形式新内容之《查路条》及《反“扫荡”》《春耕》等活报剧，大受观众欢迎；1942年晋西文联文化队在保德作第二次公演，节目有活报剧《十二把镰刀》和新作《买卖》等。《买卖》是一部喜剧，利用梆子形式写成，共分六场，内容为讽刺买卖婚姻制度，故极受观众欢迎；1944年崞县还排演了以拥政爱民为主题的五幕活报话剧。

在晋察冀边区，战斗剧社和抗敌剧社影响深远。1937年9月，战斗剧社在忻县演出《亡国恨》《铁蹄下的同胞》，10月至11月又在神池、五寨等10余县连续演出40余场，将抗日火种播撒到晋西北的山川村落。1938年战斗剧社携《八百战士》《军水船》《弟兄们拉起手来》《流寇队长》《国际玩具店》等新排剧目到静乐、岢岚等地对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抗敌剧社则以话剧、歌剧为主，1942年4月剧社演出队穿过敌人封锁线，进入斗争残酷的山西定襄、崞县等敌占区活动，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剧社的方璧、崔品之等文艺战士在崞县演出结束转移途中，路经神岗头村遭遇日军袭击，壮烈牺牲。除此之外，以延安抗大文艺青年为主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组，1940年来到繁峙等县开办了3个“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1942年春又组成20余人的“武装宣传队”，到繁峙等县潜入敌人的据点附近开展对敌宣传演出。

在晋绥边区，晋西大众剧社、二中剧社和七月剧社表现突出。晋西大众剧社以“面向农村大众，配合政治任务”为方针，排演的《以毒攻毒》《温家庄》《掺砂》《买卖》《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等现代剧目和《柜中缘》《赐环》《打渔杀家》《武家坡》《反徐州》等传统剧目超过30个，并长期在兴县、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地开展演出。以1943年为例，配合春耕及拥军工作，大众剧社出发到河曲、偏关一带巡回公演，一个月内就演出大小剧130余场，新编剧目《劳英会》《两口子》演出后，博得广大群众赞扬。二中剧社1941年在保德成立（前身为二专署大众剧团、二区大众剧社，1946年5月并入雁门剧社），排演《血泪仇》《十二道金牌》《陆文龙》《一把菜刀》《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新村风云》等剧目60余部，长期活跃于晋西北的保德、河曲、偏关、神池、岢岚、五寨等地进行演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剧社的范若愚、武晋卿等改编历史剧《十二道金牌》《洪承畴》《棋局未终》为现代剧，特别是《十二道金牌》以岳飞抗金隐喻抗战引发强烈反响。七月剧社1944年合并入晋绥文联后，创作《千古恨》《王德锁减租》《少华山》《杀狗》《围困蒲阁寨》等剧目，足迹遍布河曲、偏关、五寨、岢岚等边区各县，曾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坚持演出，如1944年在偏关陈家营村遭遇日军围剿时仍镇定自若，坚持完成演出。

此外，抗日民主政府为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乡村、学校、机关、部队自办业余剧团，进行演出活动，戏剧真正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形式。晋绥抗联也派出大批文艺干部分赴保德、河曲、偏关、岢岚等县，在县抗联内组织文化部，推动当地文化活动。由此，忻州各县和乡村剧社迅速发展起来，以五台县为例，1945年全县有剧团94个，参加人员1273名。排演的主要剧目达100多个，深入城乡公演场次更是难以计数。《抗战日报》曾报道：“保德农村剧社，近来日渐开展，该县已成立十二个农村剧团，有九个剧团已先后公演三十几次，甚受民众欢迎。”1937年五台县抗日救亡宣传队改编为五台县抗战剧团，以北路梆子、秧歌为主，包括南茹村剧团、东峡村剧团、河北村剧团等民间团体，活跃于五台县及周边地区，演出《韩林梅拥军》《爱国的女子》等自编剧目，成为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重要宣传力量。1938年由当地群众自发组建崞县抗战剧社，在崞县、代县演出《血泪仇》《抓壮丁》等剧目，1942年因日军扫荡解散。忻县的蒲阁寨民兵剧团演出了大型现代戏《围困蒲阁寨》和《赵红计摸据点》等。



定襄初中学生赴西河头地道战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张晋兰 摄

教育之光 洗礼灵魂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日寇铁蹄踏碎山河，让偌大的中国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忻州的教育事业也受到摧残，境内形成了游击区、日伪统治区、抗日根据地三分而立的特殊格局，迫使教育必须以“因时因地制宜”的智慧，在夹缝中存续和壮大。对于游击区小学，采取将其争取成“两面学校”的办法，即：备有两套课本，以奴化课本作掩护应付日伪检查，多数时间讲授抗日课本，教师多为地下党员或积极分子。1941年仅静乐、宁武、神池3县抗日政府就争取到18所两面学校。对于敌占区400多所日伪小学，则采取抵触与逃离等方法，反抗日伪推行的奴化教育。

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一改过去旧式教育，率先提出教育要为抗战服务的主张，形成了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新型教育体系，包括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义务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的“抗日的教育政策”。

干部教育以开办各级各类干部学校为主要载体。抗战伊始，面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现实，共产党组织将抗日教育提上重要日程，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短平快的干部培训先行。1937年10月，中共晋东北特委在五台县王家沟举办第一期政治训练班，培养当地工农积极分子50余人，发展了一批党员；随后又在东冶“杨爱源公馆”举办第二期，参训者40余人。1938年3月，动委会总部及保安司令部在岢岚开办军政干部训练队，学员由各县县委和游击支队选送，共办3期，续范亭、南汉宸等亲自授课，训练700人；总部还招收各地学生开办救护训练班，并在五寨三岔、宁武宁化等处设立救护站，负责救护和运送伤兵。1939年3月，晋察冀边区晋东北专员公署在五台县侯家庄创办山西民族革命中学（简称“民中”）。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也应运而生，成为特殊历史条件下锻造干部的“革命熔炉”。抗战时期民主政府创办了多所中学，其实质就是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如五台县南坪村的晋察冀边区民族革命中学、五台县塌崖沟村的晋察冀边区第一中学、河曲县海潮庵的晋西北二专区师范学校、岚县的静乐汾源中学等。其中，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简称“晋绥二中”）在当时影响深远，被誉为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这所承载着特殊使命的学校，1941年6月18日在河曲海潮庵诞生，最初以师范学校之名而立，由晋西北二专署专员楼化蓬兼任校长、王法成担任校务主任，首招两个班近百名学生，开启了烽火育人的征程。同年冬天，随着专署迁移，学校迁至保德东关，并正式更名为“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规模随之扩大，学生增至4个班近200人。办学力量也持续强化，校长由早年投身革命的老党员范若愚担任，副校长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武进卿，教导主任由刘静山、张立先后担任，教员队伍中更是集结了许光达夫人邹靖华及楚靖、张荣森等一批有识之士，为保证教学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战胜利后，学校再度迁址至五寨县城，直至1946年10月完成历史使命停办。在存续期间，晋绥二中先后开办14个班次，培养师生600余人，为边区各条战线输送了宝贵的人才力量。

群众教育以普及冬学为主要形式。冬学是冬春农闲季节农民学习政治文化的场所，学习对象以农民为主，内容包括形势教育的政治课和以识字为主的文化课，一般于农历十月开学，翌年二月底结束。因教员多为兼职且不取报酬，故又称“义学”。适应抗战形势需要，冬学逐步成为“一切工作的发动机”，从服务政治的幕后走向台前，群众有了什么问题，都提到冬学里来讨论。由此，忻州各县冬学较为普及。以1940年为例，静乐、忻县（西）、偏关、河曲、保德、岢岚、宁武、神池8个县统计，505个行政村办冬学952个，保德县（无敌区）应入学25551人，实入学人数过半；五台县除城镇平川敌占区外共办冬学155所，其中妇女冬学38所，每个行政村都有冬学，入学人数5463人，涌现出冬学模范村39个、学习模范237人，晋察冀边区《抗敌报》以“冬学运动在五台”为题报道了盛况。一些基础好的冬学多转为常年坚持的民校。通过冬学，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得到提升，参加抗战的自觉性增强。1945年秋，代县上阳华90%的学员识字300个以上；神池县利民寨、崞县上庄等冬学以组织农民参军参战、开展对敌斗争著称。除冬学及民校外，抗战初期还有民革室、大众补习学校、读报组、宣讲班、民教馆、业余剧团等组织，多隶属于冬学领导，活动广泛。

学校教育以恢复、巩固和发展为主。日军侵犯忻州，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学校设施毁于一旦，原有小学几乎全部停办；原有的6所中学，包括1902年创办的县立忻县初级中学、1913年创办的崞县初级中学、1913年创办的省立宁武第五中学、1915年创办的代县和定襄初级中学、1917年定襄河边创办的私立初级川至中学，因所在地沦为沦陷区而停办；原有的两所师范学校，位于代县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于局部抗战时撤销，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于1937年日军侵占代县后停办。在如此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和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大力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要求根据地每个行政村办一所学校。忻州根据地小学废除旧的教学制度和方法，实行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政策，男女兼收、完全免费，向劳动人民子女敞开校门；取消体罚，实行民主管理、学生自治，成立学生会、儿童团等组织。课程包括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教材以边区小学课本为基础，结合当时形势补充修改。学校生活军事化，学生站岗放哨、查路条，“扫荡”时实行空室清野、化整为零，敌来我走、敌走我回，做到“报复容易摧毁难”。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学生不仅学文化，还参加文艺宣传、教唱革命歌曲等抗日活动，课余开展勤工俭学。例如，1940年在西忻县下柏色村创立的抗日高级小学，首任校长赵贵庵赴晋绥边区培训后，采用边区自编教材，首批招生80余名，课程注重军事训练（站岗放哨、情报传递）与爱国主义教育（教唱救亡歌曲），日寇扫荡时，部分学生曾转移至岢岚宋家沟完小避难。据1941年5月忻州境内12个县（缺东西崞县、定襄、繁峙）的不完全统计，建有完小21所、初小1082所，有高级生457名、初级生41536名，平均每个行政村有学校1.8所；学龄儿童入学率以五台县最高，达70%；以静乐、宁武、岢岚、河曲、保德、偏关、五台7个县统计，女生占学生总数的35%。1944年以后，随着忻州根据地扩大、环境相对稳定，广大农民自发创办一批民办小学，以五寨县为例，到1945年11月就有民办小学7所。许多小学教员在恶劣环境中坚守阵地、无私奉献，有的甚至献出生命，五台县1939年至1944年间就有郭勇、石兰亭等10多名教员被日伪军杀害。 （下转第三版）

五台白求恩纪念馆 王光宏 摄